

日本的漢語教育*

[日]伊地智善繼

近代日本的漢語教育

這裏所謂的近代是根據歷史學家一般的說法，指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這一段時間，即從一八六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概觀這八十年的漢語教育史，則上章所述的日本漢語教育中存在的兩種特殊情況，將得到更具體的說明。下面分三部分即：①學校教育中的漢語教育，②社會上的漢語教育，③漢語教科書、漢語教授法，來論述八十年的漢語教育史。

1. 首先從學校的漢語教育論述。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簽訂了日清修好條規，當年外務省開辦了漢語學所和洋語學所。漢語學所教授漢語（當時是南京方言），其目的是爲了恢復日清間的外交關係，培養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當時有一所高等教育機構南校（後改稱開成學校），但沒有在此進行漢語教學的計劃。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漢語學所和洋語學所（後者教授俄語和德語）歸文部省管轄，改稱外國語學所。同年把開成學校的語學部（教授英語法語）從開成學校分離出來，與外國語學所合併，成立了東京外國語學校。當時在日本各地設立稱作外國語學校的學校，承擔高等教育機關的預備課程。但是東京外國語學校學制是四年，分上下等各二年，規定進高等教育機關的祇需學習下等二年，從事翻譯等實務的則要學習上下四年。這裏教授的外國語有英、德、法、俄、漢語，不久又加上朝鮮語。當時開成等學校沒有教授需要漢語、俄語的課程，因此漢語、俄語等學科的學生，學習上下四年，從事翻譯、貿易等二作。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東京外語學被廢除，當時德語、法語的學生轉入東京大學的預備學校，漢語、俄語和朝鮮語的學生轉入東京商業學校。東京大學預備學校於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成爲第一高等學校。到明治末年爲止，日本先後設立了第一至第八共八

* 本文是作者去年十二月參加本所“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究會”提出的論文《我國的漢語教育和對中國的理解》的二、三章，全文將收入本所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所高等學校，在教授英、德、法語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始終沒有設置漢語課程。

而先前所述的開成學校於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成爲擁有醫、法、文、理四個學部的東京大學。東京大學文學部設置了和漢學科，研究中國文學、哲學、史學，但這個學科沒有設置漢語，設置了法語和德語，以備選修。東京大學於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再次改名爲帝國大學，此際在博言學科（即語言學學科）初次設置了一週三小時的漢語課程。帝國大學漢文科設置漢語是在其後，而且是一週僅有一小時的狀態。江戶時代學術的代表——中國古典研究，在明治維新以後，出現了將在一旦衰亡的趨勢，東京大學文學部之所以設置和漢學科，是試圖僅以文學部這一個學科維持中國古典的研究。和漢學科的中國古典研究後來分爲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東洋史學等學科，與江戶時期一樣，其中心仍是用“訓讀法”進行中國古典的研究。當然，後來應用歐美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也出現過優秀的“支那學者”（sinologist），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大部分人祇是繼承了江戶時代的遺產。而且，很自然地，他們的研究只限古代中國，對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不太關心。因此雖然設置了漢語時間，但一般都把責任推給中國人教師，讓學生念些會話教材，學生對漢語課也沒有下過功夫。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到明治末年期間，京都、仙台、福崗各地設置了帝國大學，但是漢語教學方面和東京帝國大學大同小異，這種狀態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東京外國語學校被廢除，漢語、俄語、朝鮮語，三學科的學生轉入東京商業學校，此事已在上談過。東京商業學校於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年）改稱高等商業學校，把漢語作爲第二外國語。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再度設立東京外國語學校的帝國議會的建議得以實現，起初作爲高等商業學校的附屬外語學校開校，二年以後的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以東京外國語學校獨立。此校教授英、德、法、俄、西班牙、漢、朝鮮、意大利等八種外國語，學制爲三年。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年）前述高等商等學校成爲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於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相繼在山口、長崎設置了高等商業學校。在這些學校裏，英文指定爲必修外國語，漢語和法語、德語一同被指定爲選修外國語。根據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年）的專門學校令，成立了許多私立專門學校，其中內容充實的已採用大學的名稱。這些大學中尤其以早稻田大學設置漢語課程最早。但是，指定學習漢語的學科祇限於政治經濟科和商科，它與官立高等商業學校指定漢語的趣旨相同，這是值得注意的。

大正時代（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五年）學制得進一步調整和廣泛的普及，其內容是小學六年、中學五年、高等學校和專門學校三年，大學三年。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帶來所謂“大戰景氣”的經濟上的繁榮。從大戰結束的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前後，日本政府突飛猛進地實行了高等教育機關擴大的工作。其內容包括：高等學校十所、高等農林學校四所、藥學專門學校一所、高等商業學校七所，外國語學校一所。高等商業學校與前述的四校相同，重點放在英語上，英語是必修課目；作爲第二外國語可以選修漢語。外國語學校設在當時（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日本經濟的中心大阪，開設了漢、蒙、馬來亞、印度、英、德、法、西班牙、俄等九種學科。大阪外國語學校在

成立的時候，採取了重點放在東洋外國語的方針，漢語學科部成爲日本西部研究漢語的中心。但新設的高等學校設置的依然是英語、德語以及爲數較少的法語，沒有一個學校設置漢語。高等學校是帝國大學的預備學校，日本的統治階級分子是從高等學校畢業以後進入帝國大學的，所以漢語和日本的統治階級是沒有緣分的。大正時代又是一個私立學校發展的時期，許多私立專門學校，私立大學急驟地增加，但是允許把漢語作爲第二外國語進行選修的學校，也還仍然限於經濟商業方面的學科。據說大正末年全國有將近五百所的中等學校。大部分中等學校教授英語，爲數極少的一部分天主教教會學校教授法語、德語等，還有爲數極少的商業學校教授漢語。進入昭和時代以後，高等學校的學制和大正時期沒有變化。就帝國大學來說，大阪和名古屋二處又新設了二所以自然科學爲中心的大學。昭和十年至二十年間還新設了國立的專門學校，這些也是自然科學方面的。這些學校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太平洋戰爭（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時，爲革新和普及科學技術從而推行近代化戰爭這個目的而辦起來的。因此在所謂大學專門學校的高等教育機關裏，漢語教學沒有什麼特別進步。但是，一九三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繼而發動了侵華戰爭，在另一方又提出“日滿支一體化”的口號進行日中友好，採取了互相矛盾的行動。作爲這種事態的反應，發動侵華戰爭的那一年——一九三七年召開的帝國會議上有一個議員提出建議：“爲了（對中國）進行文化工作，最需要的是思想的理解，爲此有必要把支那語（漢語）作爲中學以上程度學校的一個學科……安排進去，與此同時在支那（中國）普及日語……。”其結果，認爲在中等學校教授漢語確實是必要的，但鑑於培養師資的困難，採取對漢文教師進行再教育的措施，暫且讓漢文教師在“漢文”的時間，加進有助於理解現代中國的適當的“時文（用當時漢語寫的文章）”進行教育。於是文部省爲漢文教員舉辦了四天“支那時文講習會”。此事反映了文部省當局還沒有考慮到日本的中等教育有學習漢語的必要，也反映了他們所持的——認爲用“訓讀法”好歹可以讀懂現代中國語——這種天真的想法。現在考慮起來豈不荒誕不經？在這種形勢的影響下，中等學校教員的漢語講習會也開辦起來，大阪出現了少數的設有漢語教科的商業學校。

2. 其次記述一下社會上的漢語教育。如上所述，明治時代一些學校進行了漢語教育，與此同時社會上也進行了漢語教育，而且後者有時在質與量雙方勝過前者。這是明治時代漢語教育的一個特徵，也可以說是其它外國語所沒有的。從明治元年到明治二十年（一八六八年～一八八七年）間誕生了日清社（明治八年，一八七七年）和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年）兩個民間的漢語教育機構。日清社是廣部精創立的。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東亞活動，印度、中國已經淪爲殖民地，在這種形勢下廣部精提出“日本與清國若不聯合，亞洲的勢力就會衰退，而兩國人之間言語不通，則不能加強團結。”他的呼吁與昭和時代的“日支親善（日中友好）”不同，有日中兩國人民攜起手來抵抗歐美勢力的意思。雖然他這樣創立了民間漢語學校，但才成立二年就因爲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的西南戰爭（明治政府鎮壓了西鄉隆盛率領的鹿兒島士族的叛亂）學生四散，以至關門。一般人認爲，聚集到這裏的學生都是對當時的統治階級抱

有反感的人。當時的統治階級都想通過學習歐美語言，吸收先進文化，建設近代化國家。當時是“凡學習漢語的人，不是被視為傻瓜就是被視為狂人。”的時代，這些學習漢語的人都是不怕輕侮而堅持要學習的人。據說還有一些組織和日清社有同樣的色彩，興亞會支那語學校就是其中一個。這個組織的會長是榎本武揚，其中包括知名的“上層社會的民權論者”，其成立的旨趣和日清社大致相同，在於亞洲人的聯合。但是這個民間學校成立後三年，因財政困難以致不能經營，學生參加轉學考試後進入東京外國語學校。

明治二十年，荒尾精在上海設立了日清貿易研究所。他本來是陸軍士官學校出身，作為參謀本部部員被派遣到漢口。當時的日本一方面擔憂西歐勢力的東漸，認為應振興日清之間的通商，另一方面雖遲人一步但想加入西歐資本主義的行列，擠入半殖民地的中國市場。荒尾精代表了日本的立場。他設立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雖然名字是研究所，但却是三年制的學校，學生是從日本全國募集來的，研究所的經費是從內閣機密費出的。這個研究所的許多畢業生從軍當了翻譯。研究所因甲午戰爭封閉。進入明治三十年代以後，善隣書院（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及東亞同文書院（明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這兩個有力的漢語教育機構先後在東京和上海開設。善隣書院是繼承前述的日清社傳統的。當時的官僚專政體制要通過吸收西歐文化建設起富國強兵的國家。善隣書院的創立者宮島大八反對這種體制，試圖主要進行以儒教思想為基礎的學術研究，提高道德和知識，從而培養出人材。他少年時留學中國，能用漢語讀四書五經，像他那樣精通經學、文學的學者，當時祇有他宮島一個人。宮島清廉潔白，善隣書院能以維持經營，一方面靠從外務省領取相當多的補助金，另一方面靠宮島投入的巨額私財。宮島編集的名叫《急就篇》的漢語教科書的版稅，恐怕是投入了經營。宮島在經營善隣書院的同時，還擔任當時剛剛成立的東京外國語學校的清語科主任，並且還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漢文科的講師。因此許多青年人聚集到他的門下，其中也出現了優秀的漢語學者。但是在善隣書院學習的青年人並不完全是想通過對中國古典的研究，提高自己的道德和知識，反之其中的多數在甲午戰爭和義和團事件以後，與日本資本滲透到中國相呼應，想到大陸去活動。

東亞同文書院同樣繼承了前述的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傳統，它是由近衛篤磨領導的東亞同文會設立的。明治初年以來，為了爭取日清的聯合，以對抗西歐向東亞的擴張，由有志者結成幾個民間團體，這些團體離合集散，最後團結大同成為東亞同文會。從東亞同文會主持人的心情來講，本來是以聯合清國為目的的，但後來逐步傾向於先進的日本必須解放後進的韓國和清國這方向，客觀上起了促進日本向大陸擴張的作用。東亞同文會提出“保衛支那”、“援助支那和朝鮮的改善”等諸如此類的綱領。東亞同文會在這種綱下，在朝鮮各地建立了學校，在中國的上海設立了東亞同文書院。很自然地，這個學校為了培養在中國大陸積極活動的青年，在漢語教育方面下了很大力量。該校的畢業生踴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條戰綫，幫助了日本在中國的擴張。隨着九·一八事變（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侵華戰爭（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等日本軍侵

略活動的擴大，東亞同文書院的規模也隨之擴大，昭和十八年昇為大學，最後隨着戰敗解散。

大正時代，日本國內出現了民衆參加政治的新的政治空氣（所謂大正民主政治），似乎官僚體制有所收斂，但是在對外政治方面，以強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為開端，開始積極展開向大陸的活動。民間的漢語教育在大正民主政治的情況下，的確可以說有一度停頓。但是，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設立的以南滿鐵道會社為中心的、東北的殖民地經營逐漸正規化，隨之大連、瀋陽、旅順等地民間辦起漢語學校，有很多旅居當地的日本人曾在這些學校學習。滿鐵及關東廳等單位也獎勵日本人學習漢語。但是，這種漢語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減少作為支配者的日本人與在日本人企業中工作的中國職員、工人之間的磨擦。一般地說來，學習漢文的日本人是下層職員、店員等，所學的漢語也只限於簡單的日常會話的範圍。進入昭和時代以後，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侵華戰爭。為了讓到殖民地滿洲或日本人佔領的地方去尋職業的人學習漢語，東京及日本各地的漢語講習會如雨後春筍地開辦起來。如前所述，近代日本的學校中的漢語教育，從明治初年到明治二十年左右的期間，是為了處理與清國的外交事務的“實務性外交外語”。而後，經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資本主義進入中國市場，漢語教育成了為處理與中國貿易的“實務性貿易外語”。民間的漢語教育，在明治二十年以前，有抵抗官僚專政體制的目的，抵抗它吸收西洋文化及搞富國強兵的近代化。此外它還有通過日清聯合阻止西力東漸的目的。在明治二十年以後的漢語教育則伴隨着日本向中國擴張，成為培養“飛向中國的青年”的、為支配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外語”。昭和時代，特別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間，隨着經濟恐慌、慢性景氣蕭條等資本主義矛盾的暴露，軍隊勢力抬頭而確立了法西斯體制的結果，終於引起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這個時代的漢語教育，不論是學校教育還是民間教育，都成了“戰爭外語”“軍隊外語”。總之，明治以來英、法、德語作為“文化性外語”教授給統治階層，漢語則一貫地作為“實用外語”教授給非統治階層。

3. 一般地說來，教亞洲各國的語言時首先採用歐美的傳教士、外交官為了傳教或外交而編纂的課本，其次是當地普通教育用的國語教科書，然後，最後的階段是經過語言學分析的科學的課本。一般都有這種傾向，漢語教學中大體上也可以看到這種情形。流傳於唐通事（漢語翻譯）之間的《漢語跬步》等是當時主要課本，其教授法是家傳式的。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年）從南京話的學習轉為北京話的時候，唐通事家裏傳下來的課本已不適用了。恰巧當時駐北京英國公使托馬思·維多寫的《語言自邇集》流傳到日本。起初人們把它抄下來，作為教科書使用。後來廣部精根據這本書寫出了我國第一本漢語教科書《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明治十二～十三年 / 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並付出版。六角恆廣氏的《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近代日本の漢語教育）》裏，有明治時代出版的漢語學習書的書名，共二四三冊，其中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出版的《官話指南》（吳啓太、鄭永邦著）、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年出版的《官話急就篇》等是典型的會話教課書。直至昭和二十年還使用它來進行過漢語教學。這些書包括

同類書在內，都是模仿《語言自邇集》設計的。其一般採取的形式是，根據意思分成類的單詞集，相互沒有關係的單詞集，關於一定事象的問答集。我們可以把這些稱作急就篇性質的會話書。這種會話書設計得讓學習者盡量多記常用說法，以便掌握社交用的會話。這些會話書上的會話都很通俗、講實用，以致有時缺乏感情。從明治中期到大正時代及至昭和二十年左右，漢語教學的一般方法是初級用《官話急就篇》，中級用《官話指南》，祇靠翻譯、背誦法去記會話性的教材。進入昭和時代以後，出現了所謂讀本式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是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左右的中國小學國語教科書的拔萃以及童話、民謠，有時還有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這些書裏面有較系統的發音練習教材和嘗試性的根據語法範疇搞出的句子的排列。但是發音練習的教材非常雜亂，根據語法範疇的語句的排列也只不過是表面現象的陳列。用它來試行語法翻譯法的教學是不可能成功的。進入昭和十年以後，倉石武四郎作的一系列的教科書都有精辟的語法說明和系統的練習教材，作為實用外語的教科書是出色的，在當時是少見的。

現代日本的漢語教育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承認波茨坦宣言，被聯合國軍佔領。在聯合國軍的管理下執行了剷除軍國主義、經濟機構的民主化、農地改革等政策。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公布了以主權在民、尊重人權、放棄戰爭為綱的憲法。敗戰以後日本的經濟由於缺乏物資、物價高騰陷入困境。從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年）通貨膨脹減緩，生產納入軌道。再看世界形勢，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以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國家之間展開了冷戰，亞洲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東南亞各國相繼獨立，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國民黨政府移至台灣與大陸對峙。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年）朝鮮半島上爆發了朝鮮戰爭，在此楔機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在舊金山，日本和聯合國之間簽訂了和平條約。從昭和三十年左右（一九五五年）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國民總產值年年增高，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達到僅次于美國的地位。在此期間，日本的文化大眾化，科學技術得到發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擴大，國民意識也產生變化，開始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日本政府和聯合國之間簽訂的和平條約是根據美國對日政策簽訂的，因此中國和蘇聯被排除在外。其結果，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日本政府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之間簽訂了日華和平條約。日本政府在內心雖然對否認北京政府是躊躇的，但被編入舊金山體制中，與中國對立。日本政府一邊慎重地調整步伐，與美中關係的緩和求得一致，一邊保持不與台灣斷絕經濟關係，而謀求改善日中關係。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總統實現了訪華，以美中兩國的和解的發展為楔機，同年田中首相也訪問了北京，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待去年鄧副總理來日，終於簽訂了日中友好和平條約。

1. 對中國及漢語的看法的變化。

戰後已經三十年了，存在於我國的漢語教育的特殊情況發生了什麼樣變化呢？第一章第一節所講的對漢語的看法，就大多數國民還不能說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隨着日本的國際交流的擴大，有關外國文化情報的增多，日本人對漢語的意識漸漸地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就那些戰後接受新教育的青年來講，他們關於漢文漢字的知識和戰前的人比較起來相差很多。另一方面，漢語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譬如，漢字的簡化，漢語拼音文字的制定，普通話的普及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老壯年人中“同文同種”的觀念依然還很牢固，但是在青年人中，已經開始樹立起了漢語是不同於日語的一種外語這一概念。

在第一章第二節所談到的對中國文化的看法，與對漢語的看法比較起來，我們可以說前者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般的日本人（暫且不談意識形態的問題），對侵華戰爭所犯的罪過抱有歉意，對於中國人要比對其它亞洲人抱有更深的、人種上的親近感。對於中國文化抱有敬仰之意，此外，有一種其他外國人近乎不能理解的、很深的，與中國人共同的感受。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意識形態有共鳴的青年人，蘇聯和中國是他們所憧憬的。當然，三十年來日本人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起初他們對蘇聯有強烈的共鳴，但隨着對蘇聯社會實際情況的逐步了解，對它的共鳴逐漸削弱。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關心，繼而又集中到中國。但是一九六六年隨着日中兩共產黨對文化大革命評價的對立，他們之中一部分人對中國失去希望。一部分人則更傾向中國，表示出狂熱的共鳴。後來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日中交流中，政府之間的實際交流佔了較大的比例，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也逐步為人們所知道，隨着這種情況，他們從過去狂熱的共鳴轉向理智的共鳴，這是一種傾向。但是，從全體來看，日本人對中國的親近感是非常強的。這一點從過去的輿論調查也可以看出來。今年十月美國的格拉浦調查所和讀賣新聞共同進行了調查，根據這個調查可以知道日本人所信賴的國家是：美國第一位，英國第二位，中國是第三位。把信賴的國家這一提法改為好的國家，我想其結果也會大致相同。從這種情況看來，我們可以說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大不相同。

2. 漢語教育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仿效美國改為六·三·三·四制，從昭和二十四年設置了所謂的四年制新制大學。戰前的大學、高等學校（舊制），專門學校通過合併，或者單獨地，成為新制大學。據一九七七年文部省統計，新制大學共有四百三十一所，學生數為一百八十三萬九千三百六十三人。新制大學開設的科目有：一般教育科目、外語科目、專門教育科目。一般教育科目和外語科目原則上在四年的前期二年基礎課程（教養課程）裏進行。外語科目要學習二種以上的外語。在社會科學方面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大學的學部基礎課程裏，漢語是第二外國語。在基礎課程裏設有漢語的大學，據推測大概要超過一百所。新制大學剛剛開始的時候，選擇漢語的學生和選擇法語、德語的學生比較起來真是寥寥無幾。但後來逐漸增加，特別是從昭

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前後急驟增加。增加最多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學部，選擇漢語的學生數和選擇法語、德語的差不多。這個事實大概是因為學習漢語有利於就業。但是人文科學方面的大學學部選擇漢語的人還很少。而且在所謂的一流大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兩方面選擇漢語的學生都比選擇法語、德語的少得多。這個現象大概是因為他們認為，學習歐洲語言要比學習漢語在學術研究上更有用。

基礎課（教養課程）的外語科目的目的是培養：①廣泛的修養和判斷能力、分析能力；②為進行專業教育所需要的閱讀能力；③能夠在國際社會上進行活動的實際能力。日本的大學至今把外國語科目的目的放在吸收歐美的知識和技術上，認為①的“廣泛的修養、判斷能力、分析能力”是歐洲市民的修養；要通過學習歐洲的各種語言得到判斷能力、分析能力。如果堅持這種觀點，很明顯，通過漢語學習是不能達到①的目的。但是，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和民族，它們經過各種歷史的發展階段到達今天，採取了各種政治和經濟體制，使人們產生了各自的思維和活動方式。如果我們把這種思維和活動方式的總和叫作文化的話，不僅歐洲各種語言的學習，而且漢語或其它外國語的學習也會給日本人提供廣泛的國際視野。如果這樣考慮，那麼在基礎課程中學習漢語的意義是充分的。但是遺憾的是這種想法在日本的大學還沒有形成，另一方面漢語教員還沒有作好把國際視野提示給學生的準備，這是我們的現狀。關於②的閱讀能力、③實際能力，每週二次，一次二小時這種教學時間是很難令人滿足的，這是自明之理。

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學部，特別是濟經大學、學部與其它大學，學部比較起來，擁有很多的中國研究的人員。可是他們還認為漢語文獻比較容易閱讀，輕視培養漢語的基礎能力。人文科學方面的大學、學部的研究中國的學科是中國文學科、中國哲學科、東洋史學科（大部分是研究中國史），相當多的大學設有這些學科。中國文學科分為兩種，一種是把重點放在用漢文訓讀來研究中國古典的，另一種是學習漢語，把重點放在研究近代和現代中國文學上，因大學而異。但是在前一種學科裏，學生也關心中國近、現代的文學，所以漢語的學習是必要的，但是還沒有做出正式着手漢語教育的努力。東洋史學科對漢語教育最冷淡，閱讀文件還利用漢文訓讀，糊里糊塗地讀，即使鼓勵學習外語，也是把歐美的中國研究作為模範，重點放在學習英語、法語上。以上是東洋史學科的一種傾向。

把漢語作為專業科目來教的大學、學部是外國語大學、學部，戰前只有東京外大、大阪外大、天理外大三所。戰後誕生了包括公立、私立的十五個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部，其中八個設有漢語科，一學年合計四百七十五名。非常遺憾的是，這些外國語大學、學部雖目的是培養從事日中兩國間的國際事物，但是學生的漢語實際能力並不高。這裏面有各種原因，例如：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用漢語的職業範圍有限；現在日本的大學大眾化，許多動機不純的學生入學，造成學生之間差距很大；不是所有的教員都有很高的漢語水平；提高漢語水平的適當教材還沒有充分準備好。但是有一定的基本能力的學生，畢業後到和中國有關的企業就業，在企業內的教育機構或民間教育機構，接受相當嚴格的再教育，則有迅速進步的可能性。

關於漢語的民間教育機構，沒有詳細的調查，所以不能介紹正確的情況。但東京方面有亞洲非洲語學院，霞山會中國語講習會、日中學院，中國語研修學校，善隣書院等民間機構，據一九六六年調查，推測有一千名學員。各地的日中友好協會也舉辦了講習會。在這樣的教育機構學習的學生的動機真是多種多樣。例如：將來會有用；作為一種修養學習；學術研究的需要；實際業務的需要等。其中佔前三位的是對中國革命的共鳴及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憧憬等，有時是對日本的體制的抵抗。（以上的報告根據：中國的會編《中國》No.30,1966）此外，有些人想通過民間漢語教育運動熱烈地推動日中友好運動，他們出版了叫做《中國語學習運動》。

3. 漢語研究的發展

我們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漢語研究，要比明治、大正幾十年的研究，（從研究者的數的增加、研究領域的擴大、研究內容的提高來看，）有顯著的成長。但是戰後的這種發展，在昭和十年代後半就已經萌芽。如前所述，倉石武四郎在昭和十三～十四年（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吸收了中國國語運動的成果，加上自己獨到的見解，編纂了許多優秀的課本。他在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出版了《支那語教學的理論和實際》，從正面否定了過去的漢文訓讀，與此同時展示出新的漢語學的建設藍圖。另外，魚返善雄翻譯和介紹了 G. Karlgren（高本漢）等歐美的漢語研究者的論文。在中國以黎錦熙等人為中心的國語運動於一九一三年開始，在運動過程中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也是成果之一。這本語法書雖然是實用性、規範性的，但是它初次系統地闡明了漢語的構造。黎錦熙除了語法書以外，還作了《國語模範讀本》、《復興說話教本》等。這些教科書雖然是為教給中國人普通話用的，但在當時是完全根據新的語言教授法寫的一本書，雖然不能原封不動地拿來作日本人的漢語教科書，但與當時日本的讀本式教科書相比，要好得多。還有，當趙元任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員的時候，進行了學術性的中國語言學的研究，對漢語音聲學、音韻學、方言、語法進行了多方面有價值的研究工作，與此同時還編纂了像《新國語留聲片課本》這樣科學性的教科書。這些著作戰時在日本很容易買到，但是日本的漢語學者除了倉石、魚返二氏以外，幾乎沒有看到有人利用過上述這些研究成果的跡象，現在看來，確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才看到了戰時在美國進行的漢語研究和根據這些研究編寫的課本。看了趙元任的《Mandarin Primer》、Charles F. Hockett及房兆楹的《Spoken Chinese》、Jhon De Francis 的《Beginning Chinese》等集中語言教育課本，才知道用構造語言學研究出的中國語法的面目。還有，我看到了在中國的大後方呂淑湘、王力根據一般語言學編纂出版的語法書，我們也看到革命後丁聲樹等人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以及其它大量的論文、啓蒙書、教科書等。北京外語學院根據他們教給留學生漢語的經驗，編寫了幾種漢語基礎讀本，這些書給日本漢語教育界很大的刺激。

如上所述，日本的漢語學者、教育者很快地吸收了中國、美國的研究成果，正努力追趕先進水平。現在正依據變換語法、格語法等新語言學，一步一步地進行研究。這些工作在一定範圍內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還沒有出現完整的著作。另外，出版了許多平凡

的教科書，但很遺憾還沒有出版一本能代表日本的，並能為世界上的人們有所貢獻的教科書。

注：關於《近代日本の漢語教育》一章參考了六角恒廣著《近代日本の漢語教育》、六角恒廣、橫山宏著《中國語への道》（1975年）及安藤彦太郎著《日本人の中國觀》，深受啟發。另外參考了魚返善雄的論文《日本華語界の方向》（上下）《中國語雜誌》1949年1月號 4.5月號所收）、井上翠的《松濤自述》等。